

# 冷戰時期 美國社會學的蘇聯研究(上)

●周陸洋、李文榕

編者按：由於篇幅關係，本刊將分兩期刊出文章，本期先刊出第一至三節。

當前中美面臨新冷戰風險，雖然雙邊關係的複雜性是國際政治的諸多結構性因素造成的，但不可否認兩國對彼此的認知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了解美國對中國的認知模式因此十分重要。儘管中美關係和美蘇關係存在本質區別，冷戰時期美國的「蘇聯研究」(Soviet Studies)仍不失其參考意義，畢竟很難找到第二個像美國那樣持續數十年研究競爭對手的歷史案例。正因為如此，自冷戰結束以來，對美國的「蘇聯研究」的反思就從未停止。

二十世紀90年代學者把蘇聯研究等同於「敵情研究」路徑的「蘇聯學」(Sovietology)，因而對蘇聯研究的評價比較負面。評價者認為這一領域嚴重意識形態化且缺乏信息，是被利益集團綁架的敵情研究，不僅蒙蔽美國決策而且毫無學術價值。新世紀以來這一認識有所變化，學者逐漸認識到，窺測判斷蘇聯行為根源的「蘇聯學」只是蘇聯研究的一個分支。這一分支與政府、軍隊、情報和大眾傳媒結合，配合相關利益集團渲染蘇聯威脅，誇大蘇聯的力量及其意識形態執念。事實上，在「蘇聯學」之外，美國龐大的人文社會科學甚至自然科學也在參與對蘇聯的研究。這些研究對蘇聯的認識更為複雜和全面，內部也含有更多的爭議和糾結。分門別類、從特定學科視角入手梳理美國的蘇聯研究，是當前學術發展的基本趨勢。

延續這一趨勢，本文從尚未被系統探索的社會學入手，梳理冷戰時期美國社會學的蘇聯研究，並着重回顧那些立足經驗研究、致力於發展中層理論的學術作品。筆者認為，社會學的蘇聯研究既有捍衛美國價值觀的清晰問題意識，又對意識形態偏差保持警惕，並且充分依託美國國內現代化、多樣化以及全球帝國的信息優勢，在雙方隔絕的困難條件下獲取了大量關於蘇聯的有益知識，呈現出蘇聯的多元複雜面相。雖然相關社會學研究對蘇聯的認識也不無偏頗，其中的經驗教訓卻值得每個具有全球議程的大國汲取。

本文分為六節：第一節通過回顧學界對「蘇聯學」的評價反思，具體說明美國認識蘇聯過程中所面臨的困難，以及為何社會學的蘇聯研究值得專門著文研究。第二節講述美國社會學與蘇聯研究的關係，說明社會學的獨特性，並簡要介紹本文的資料來源和分析方法：先從美國社會學三大旗艦雜誌篩選出蘇聯研究最為集中的六個社會學議題，然後根據這些議題選取對應的專業雜誌上關於蘇聯的研究進行分析。第三至五節按照時間順序回顧社會學六個基本領域的蘇聯研究，依次為革命、人口、現代化、醫療衛生、環境和族群。第六節總結全文，概括美國社會學認知蘇聯的優點，並指出這些優點是社會學與冷戰背景的複雜嵌入關係所致；最後也討論社會學的蘇聯研究為整個美國社會學留下的知識遺產。本文討論的「美國社會學」並不都是美國學者的研究，引用的觀點有部分為歐洲學者貢獻、在美國學術界形成重大影響。在此意義上，讀者也可以從中窺見冷戰時期西方學術界整體對蘇聯的印象。

## 一 冷戰結束以來學術界對蘇聯研究的評價

研究蘇聯並不容易，對蘇聯的許多認知偏差延續至今，並產生深遠的影響。比如，作為蘇聯軍事遺產主要繼承國的俄羅斯，其軍事實力經常被誇大。儘管俄軍在兩次車臣戰爭（1994-1996、1999-2009）和格魯吉亞戰爭（2008）中的表現未如人意，俄羅斯卻繼續被外界視作軍事強國，直到2022年爆發的俄烏戰爭僵持不下的事實讓這一話語難以為繼。這種認知偏差與冷戰時期美國的蘇聯研究密切相關。部分美國研究者誇大蘇聯力量和意識形態僵化性，其中摻雜了信息閉塞、利益集團政治、製造敵人等有意無意的因素，而這種誇大的長期存在和廣泛傳播，本身又產生了進一步影響。它不僅支持了美國軍工綜合體的經濟利益，而且為西方自由主義者提供了某種克服內在分歧的團結，甚至為超級大國之間的衝突提供了某種不言自明的行動依據。就連俄羅斯決策者也從對手對蘇聯力量的誇大描述中受益（比如以國際局勢緊張為由爭取更高的軍事預算、進行更嚴格的意識形態控制），久而久之被這種扭曲蒙蔽。對美國而言，認識蘇聯是一項重要而又困難的工作，準確認識蘇聯固然重要，但準確又從來不是唯一的準繩。政治、利益與學術的糾纏，以不同的方式影響到蘇聯研究的各個分支，由此形成了廣闊的光譜。蘇聯解體之後，美國繼續遇到新的挑戰者。能否準確認識這些挑戰者，取決於美國如何總結反思自身過去的對外認知。

自冷戰結束以來，對蘇聯研究的反思就已經開始，相關評價在整個1990年代基本負面，而這一時期也見證了大批蘇聯問題專家失業轉行、研究項目和機構關停改造。在為數眾多的蘇聯研究中，以揣度研判蘇聯戰略動機為目標的「蘇聯學」遭受批判最猛，被認為是一個「破產」的領域，甚至不被承認為學術。比如拉特蘭（Peter Rutland）認為，蘇聯學家因為無法進入蘇聯、對語言掌握不足、排斥社會科學方法、在極化政治陣營間選邊站，沒有也不可能建立起一門嚴謹的學科，只能在新聞動態、政治八卦的邊緣徘徊<sup>①</sup>。儘管

如此，這一時期也存在更為客觀的評價。俄裔歷史學家什拉彭托克 (Vladimir Shlapentokh) 就指出，蘇聯研究是一個多學科的龐雜知識體系，有多種解釋路徑，由於進入蘇聯的困難導致美國本土產生的社科方法難以運用，是可以理解的。雖然美國國內的政治禁忌產生了諸多禁區，不同進路的研究質量還是有所差別。他特別指出，就判斷力而言，社會學是一個偏見較小的領域，很多冷戰時期得出的研究結論在前蘇聯地區信息開放後得到印證，而這可能得益於社會學缺少清晰一貫的知識內核 (下詳) ②。

進入二十一世紀，或許由於美國的世界再造計劃並不如想像中順遂，對蘇聯研究的反思出現了逆轉。一些學者指出，蘇聯解體作為複雜的歷史過程是多重因素導致的，本來就難以預測，不能因為個別誤判就對數十年蘇聯研究的積累作全盤否定。對於取得冷戰勝利的西方而言，推動蘇東地區轉型是一個艱鉅任務，美國仍然需要增進對於這些地區的認識，不能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對以往積累徹底否定，犯上二次錯誤 ③。對蘇聯研究評價的逆轉首先表現在學者提出了「蘇聯學」與「蘇聯研究」的區分。相對於類似敵情研究的「蘇聯學」，「蘇聯研究」是更為寬泛的概念，包含了人文社會科學各領域甚至自然科學和技術。

有學者指出，不同學術領域對蘇聯的認知力是有差別的。恩格曼 (David C. Engerman) 在其里程碑式的著作《認識你的敵人：美國蘇聯專家的興衰》(*Know Your Enemy: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s Soviet Experts*) 中將蘇聯研究區分為文學、歷史、政治、社會等多個領域，分別評估了每個領域在資料獲取能力、與政府關係方面的差異。例如，資料獲取對於經濟學和社會學是短板，但是對於文學和歷史學則並非如此，而後兩者對於判斷蘇聯社會長期穩定的結構性特質很有幫助。恩格曼特別指出，蘇聯研究並不是鐵板一塊的被利益集團綁架的敵情研究，而美國政府、高校、智庫、企業和公民組織共同塑造的知識生產過程，事實上體現了美國多元社會結構的內在張力，冷戰時期完成高等教育的學生後來步入政企高層，他們接受的蘇聯研究知識對後來美國各領域的決策產生深遠影響 ④。

冷戰結束以來，對蘇聯研究的評價從總體否定轉向就個別領域作獨立評估，也不再簡單地將蘇聯研究視為意識形態和利益集團的工具。這本身反映了對美國知識生產和冷戰史的多面理解：美國既是多系統互相競爭的民主社會，也具有高度組織協調性和清晰專業分工；美國對許多問題存在認知上的偏見和盲區，與此同時也有較快的反思糾正能力；冷戰對人文社會科學的影響與其說是製造某種統治性的意識形態觀點，不如說創造了共同的焦慮和穩定的辯論議題。按照這樣的學術評估趨勢，冷戰時期美國社會學的蘇聯研究是一個有待梳理的領域。

社會學的一系列特點讓它成為洞悉帝國認知力的特殊窗口：社會學對經驗資料蒐集的要求較高，而且尋求對資料的模型化和理論化，致力於從具體個案中發現一般規律，在美蘇兩強彼此封閉的冷戰時期，這樣的學科追求對於社會學者是巨大挑戰；社會學總體上關注相對穩定的社會結構和長時段社會變遷，研究過程受快速變化的新聞事件和偶然個案擾動較少，這就與追求

「短平快」、追蹤蘇聯動態的敵情研究大異其趣。但也不同於動輒回溯上千年的歷史研究，社會學擁有龐雜的理論體系，主要經驗聚焦點是西方社會自身，同時又不乏具普遍關懷的跨國比較，這些都是社會學家在無法進入蘇聯的情況下能夠動用的資源和方法；特別重要的是，社會學總體上缺少單一固定的知識內核與範式，內部分科碎片化、多元化，本身相當於一個多學科領域，而且各分支與政治的聯繫程度不一，有利於對某個異國的傳統成見、政治因素等實際影響問題進行比較研究<sup>⑤</sup>。

## 二 美國社會學的蘇聯研究

美國社會學與蘇聯研究的聯繫源遠流長。其中，芝加哥學派 (Chicago School)、符號互動論 (symbolic interactionism)、社會交換論 (social exchange theory) 等學派創始人在知識形成上早於俄國革命，對外部世界的關注也十分有限，與蘇聯研究並沒有直接關係，但從起源上說，美國精英懷有對歐洲舊世界的恐懼，擔心階級鬥爭、社會主義等歐陸思潮蔓延傳播。與此相應，十九、二十世紀之交處於形成階段的美國社會學試圖通過發現社會運行規律來延續和保衛美國的例外，並因此帶有拒絕社會主義、宗教激進主義的保守氣質<sup>⑥</sup>。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社會理論家的論述開始直接指向蘇聯對美國的威脅。思想家觀點立場各異，卻共同關心兩極對抗格局下如何捍衛自由、民主價值觀，他們的著作普遍包含着對納粹捲土重來、蘇聯社會主義滲入西方、第三世界通過反殖走上非西方道路的擔憂<sup>⑦</sup>。隨着兩極格局趨於穩定，這種擔憂有所緩和。比如，豪爾 (Irving Howe) 與科塞 (Lewis Coser) 認為斯大林主義的極端思想在經濟政治破產的絕望社會最容易獲得成長機會，格萊澤 (Nathan Glazer) 則清晰指出雖然共產主義具有傳播性，卻難以在經濟富庶、民主穩固的西歐和美國形成氣候<sup>⑧</sup>。

兩極格局進一步成形後，思辨性社會理論家對美蘇兩種體制進行了既廣泛又深入的比較，試圖發現哪一種更有創造力、更具適應性。馬爾庫塞 (Herbert Marcuse) 把「單向度人」(One-Dimensional Man) 理論用於美蘇比較，認為蘇聯和美國一樣單向度，追求標準化工業生產，文學藝術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控制下失去超越性和創造力，哲學只在口頭上保留辯證法。但他對蘇聯抱有同情，認為蘇聯只是為尋求安全而推動工業化，其社會進步沒有美國式利益集團的阻礙。貝爾 (Daniel Bell) 的「後工業社會」(Post-industrial Society) 理論認為資本主義正在出現信息化、知識化的發展趨勢，由此帶來勞動關係變化，終將造成傳統階級鬥爭和意識形態的終結，贏得與蘇聯的競爭。對美國社會學衝突理論有很大影響的達倫多夫 (Ralf Dahrendorf) 則認為任何社會都無法消弭衝突，因此蘇聯不但不會過渡到馬克思所說的無衝突社會，還會由於規避和壓制衝突帶來災難性後果，而民主政體對衝突的承認和管理能夠讓它在與共產主義政體的競爭中勝出<sup>⑨</sup>。



除了思辨性的社會理論，美國社會學的蘇聯研究也是一個龐大的經驗研究領域，學者大多致力於歸納具體經驗事實，並在此基礎上發展介乎調查報告與思辨學說之間的中層理論。隨着斯大林去世，美蘇隔閡打破、雙方信息往來增加，這類研究呈現總體增長的趨勢。如前所述，社會學是一個龐雜的學科，即便是社會學家專門針對蘇聯的研究，也涉及數十個主題。本文主要梳理美國社會學旗艦雜誌——《美國社會學雜誌》(*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美國社會學評論》(*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和《社會力量》(*Social Forces*)的蘇聯主題文章和書評，整理出社會學家最為關注的六個領域，分別是革命、人口、現代化、醫療衛生、環境和族群研究。這六大領域在美國社會學以及一般社會學中具有重要地位。它們共同的特點是注重美國和西方文明內部的重大問題，而不是像敵情研究路徑的「蘇聯學」那樣，將威脅歸咎於某個邪惡的外部因素。我們甚至可以說，這些研究是美國借鏡蘇聯的經驗來認識自身的學問。

革命研究是社會變遷研究的分支。它試圖形成一套關於革命起源、成功和消退的一般化理論。雖然革命社會學從階級剝削結構、社會怨憤、機會窗口、精英領導力和國際環境等多個角度解釋革命的成敗，但在本質上是防止革命的研究。美國建國以來的其中一個重要政治訴求，就是試圖規避法國大革命那樣的血腥暴力所造成的急速整體性社會變遷。經濟、技術、人口等方面的變遷是不可避免的，美國社會學並不試圖壓制變遷和衝突，而是努力建立一套能夠適應社會變化、局部漸進、自我調適的社會系統，防止各部分變遷速度的差異導致激烈的社會革命。美蘇崛起為超級大國之後，美國學者試圖將這套系統加以理論總結、推廣到全世界，與各種謀求劇烈變化的革命暴政抗衡。這樣的訴求產生了以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為代表的結構功能主義社會學<sup>⑩</sup>。

人口研究是社會學的一個重要分支。人口對一國的經濟增長、性別關係乃至國際地位有着決定性影響。人口轉型是人口學的主要理論之一。它認為隨着工業化、城市化展開和教育水平提升，一個社會的人口增長速度會逐漸回落，甚至出現停滯和負增長。對冷戰時期的美國而言，第三世界人口增長直接關係到這些地區的政治歸屬。人口爆炸造成的物資短缺和社會動盪會給共產主義提供機會，而限制人口增長的方式就是輸出美式現代化和經濟增長模式。在複雜數學模型的表面之下，人口轉型理論充滿了政治性考量<sup>⑪</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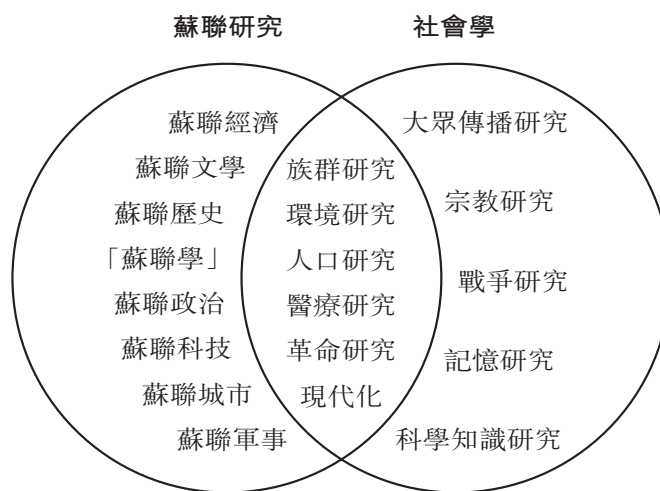
現代化研究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學界首次對大規模文明輸出遇挫的反思。二戰後美國和西方國家曾在第三世界大舉開展經濟技術援助，但收效不如預期。一個普遍的判斷是，這些援助未能考慮本土情境的文化風俗和制度，由此衍生出探討「傳統」與「現代」關係的現代化研究<sup>⑫</sup>。

醫療衛生關係到資本主義制度的自我改良。醫學社會學本來是解釋疾病如何被社會系統發現和建構的學科，福利國家研究則考慮議會民主制度究竟能否限制和消解資本主義制度導致的不平等——自由派擔心大眾民主威脅私有產權，左翼則認為議會民主制是百無一用的空殼。在兩極對抗條件下，這種關切演變成能否建立一套與蘇式社會主義分庭抗禮的醫療和福利制度<sup>⑬</sup>。

環境和族群研究預示着以階級對抗為核心的意識形態角力正在被新的衝突形態所取代。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在西方形成了強大的環境抗議運動，突破了階級認同甚至傳統民族國家邊界的限制，改變了社會運動的認同基礎，而且對核武器和其他許多破壞性技術的使用形成了限制性的禁忌<sup>⑭</sup>。族群研究反映了美國維持帝國的焦慮，即如何防止美帝國內部的族群問題上升為民族主義的反抗，以及如何利用民族主義削弱共產主義政權之間的團結。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關係因此籠罩着美國的社會科學研究，有學者甚至認為二者的合流是難以避免的歷史趨勢，並進一步增強自身的生命力<sup>⑮</sup>。當然，族群問題很大程度上已經是一個後冷戰問題。只是在傳統的階級對抗呈現出落幕迹象之後，在蘇聯和南斯拉夫廢墟上接踵而來的內戰和族群清洗才成為社會學者關注的新焦點<sup>⑯</sup>。

筆者從1917年十月革命到1991年蘇聯解體期間美國社會學三大旗艦雜誌中<sup>⑰</sup>，選出從上述六個方向考察蘇聯的研究進行分析，這些研究以論文、觀察筆記和書評等形式呈現。據筆者統計，以革命為主題的有12篇，現代化15篇，人口14篇，醫療衛生13篇，環境問題15篇，族群問題11篇。這六個方向的文章數量，在各分支的蘇聯研究中位居前六名。其他方向的文獻則相對零散，單個領域很少超過5篇。其中，蘇聯的社會分層、經濟發展、職業與專業、工廠與勞動、宗教等方向的研究在不同程度上與革命、現代化主題相關，而性別、婚姻、教育、犯罪越軌、日常生活研究則與人口、醫療衛生主題相關。這清晰地顯示了六大方向在社會學的蘇聯研究中的重要性。當然，美國社會學中也有一些幾乎不涉及蘇聯的研究方向。雖然它們的研究對象在蘇聯也大範圍存在，但美國社會學家極少觸碰，比如大眾傳播研究、宗教研究、戰爭研究、記憶研究和科學知識研究（圖1）。這些空白值得專門撰文分析。

圖1 蘇聯研究、「蘇聯學」、關於蘇聯的社會學研究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說明：「蘇聯學」只是蘇聯研究的一個分支；兩個圓的重疊部分是美國社會學的蘇聯研究。

三大旗艦刊物大體反映了冷戰時期美國社會學對蘇聯的核心興趣，但遠不是冷戰時期美國社會學對蘇聯的全部研究。在此基礎上，我們考察了冷戰時期六個領域各自的頂級刊物上關於蘇聯的研究。這些社會學刊物包括《社會學》(*Sociology*)、《民族研究》(*Nationalities Papers*)、《人口學》(*Demography*)、《人口研究》(*Population Studies*)、《環境科學與可持續發展》(*Environment Scien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公共衛生政策期刊》(*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Policy*)、《社會政策與行政》(*Social Policy & Administration*)等。此外，我們也梳理了社會學家發表在區域研究刊物《蘇聯研究》(*Soviet Studies*)、《共產主義問題》(*Problems of Communism*)和《比較共產主義研究》(*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上的研究成果。限於篇幅，本文不可能完全展示這些文獻，對於所引用的文獻也不可能展示所有細節。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六個方向是平行的。就其研究對象的產生而言，沒有明確的時間先後關係。俄國革命在內戰結束時就已宣告勝利，革命的長期影響卻觸發了持續不斷的研究，彷彿蘇聯歷史是永恆不斷的革命。人口變遷並不是蘇聯時期才有的問題，只是革命後的家庭政策以及蘇德戰爭的影響，使得學者很早就追蹤研究蘇聯人口。醫療衛生制度和現代化也與冷戰無關，全覆蓋的福利制度在斯大林時期就已經啟動，在赫魯曉夫(Nikita S. Khrushchev)和勃列日涅夫(Leonid I. Brezhnev)時期得到強化。現代化是俄國持續了幾個世紀的歷史進程，其作為一個領域是現代化研究在美國興起的結果。環境和族群問題雖然直到1970年代才被建構為專門的學科對象，但它們早在沙俄時期就已經存在。研究對象本身並非冷戰造成，但它們的對象化卻與冷戰有關。

如前所述，冷戰時期美國關於蘇聯的社會學研究並不是一個具有清晰邊界的領域或學科，它和政治學、歷史學、經濟學等諸多學科頗有交集。這種模糊性有時是因為學者本人的研究橫跨多個學科，有時由於研究對象的時空廣度要求多學科合作，有時則與資料和方法的共享有關。在歷史社會學領域，蘇聯只是多個比較研究個案之一，代表了一種不同於西方的現代化道路，而且對蘇聯的個案分析也總是和沙俄聯繫在一起。例如安德森(Perry Anderson)和艾森施塔特(Shmuel N. Eisenstadt)都兼具社會學家和歷史學家身份，他們從長時段的角度強調俄國社會結構遠比西歐單一，缺少能夠制衡權力的商業市鎮和貴族，因此容易在戰爭、專制君主等偶然因素刺激下發展出穩定的超強集權系統，而針對這種集權系統的反叛如要成功，需要拔除社會根基，形成社會革命和更強大的專制<sup>⑬</sup>。

班迪克(Reinhard Bendix)的研究橫跨社會學與政治學，同樣在歷史大縱深維度上討論蘇聯的獨特性。通過與新教國家的比較，他認為俄國傳統上缺少工作倫理，而是依靠強制維繫勞動生產。這種集體心理延續到革命後則限制了蘇聯的理性化，形成了黨政兩套系統各自按照不同標準理性化而又彼此衝突的局面<sup>⑭</sup>。再比如布萊克(Cyril E. Black)主編的《日本和俄國的現代化：比較研究》(*The Modernization of Japan and Russia: A Comparative Study*)<sup>⑮</sup>，從多個維度對日俄兩國的特殊道路進行比較，認為日俄政治統一歷史傳統悠

久、國家力量強大、吸收西方技術積極，代表了一種非西方現代化路徑。此書涉及政治、國際關係、經濟、人口、社會發展、城市化、教育文娛和地理領域，社會學家的貢獻穿插其間。

至於資料層面的共享，典型莫過於著名的「哈佛蘇聯社會制度項目」(Harvard Project on the Soviet Social System)，原是美國空軍資助哈佛大學俄羅斯研究中心設立的蘇聯移民口述史項目，但在實際使用中不僅服務於歷史學家，也成為社會學、記憶研究等學科的信息源<sup>②</sup>。

### 三 革命研究與人口研究：始於蘇聯形成

革命研究是最早進入美國社會學視野的蘇聯研究領域。俄國革命爆發後，大批俄裔學者流亡美國，構成這一研究領域的起始。俄裔社會學家雖然身在北美，卻保留了沙俄時期的問題意識，繼續追問俄國在人類現代化變遷和文明興衰更替中的歷史地位，與美國主流社會學的經驗調查路徑大異其趣。受「紅色恐懼」(Red Scare)影響，二戰前的美國社會學提出過革命研究的方向，像索羅金(Pitirim A. Sorokin)這樣的社會學大家撰寫了一般性革命理論，但是並沒有由此開創美國社會學的蘇聯研究(儘管該書的每一部分都援引俄國的例子以說明作者的觀點)<sup>③</sup>。二戰結束時，隨着美蘇交往增加和蘇聯地位上升，歐洲社會學家關於俄國革命的早期思考被美國學者廣泛引用。比如歷史學家派普斯(Richard Pipes)回顧了韋伯對俄國革命的悲觀預測。韋伯認為俄國缺乏美國那樣的公民文化土壤；自由主義者或是自絕於經濟利益集團的鄉村浪漫派，或是缺乏行政實務經驗的城市知識份子；社會主義者則與傳統密謀組織盤根錯節，即便奪取政權也會向官僚制投降而非推行民主<sup>④</sup>。這種判斷奠定了美國社會學對俄國革命的保守認識，而這種認識與兩次世界大戰之間西方學界對社會主義政權的種種悲觀預測是一致的。隨着有關蘇聯的資料愈益增加，通過理論推論來抓住蘇聯核心特徵的研究方式顯得不足。

冷戰開始後，美國社會學對俄國革命的不確定感進一步增強。研究宏大社會轉型的社會學家想要評估工業化和技術理性的影響，即日益工業化的蘇聯是否可能淡化馬列主義意識形態、成為一個西方意義上的「正常國家」，蘇聯的革命起源可以提供觀察縱貫變化的時間維度。摩爾(Barrington Moore)的比較歷史研究正是這種典範。他把俄國革命的意識形態區分為若干不同元素，解釋哪些元素在漫長的革命中被布爾什維克拋棄或得到保留<sup>⑤</sup>。與宏觀歷史社會學並行不悖的是對「革命締造者」的研究。美國社會學家試圖理解發動革命的是甚麼人以及這些人是如何形成的。在這一進路下，學者從宗教、族群、革命者之間代際學習等角度出發，為俄國社會主義運動的發生提出了諸多解釋<sup>⑥</sup>。

隨着美蘇關係緩和、雙方交流增加，美國社會學開始討論俄國革命的必然性和「失去的歷史可能性」。借助在蘇聯實地閱讀檔案的歷史學家的相關著述<sup>⑦</sup>，社會學家改變了「工人運動土壤貧瘠」、「不受歡迎的社會主義者密謀奪



權」等看法，轉而認為俄國革命是多重複線過程，內部存在着類似歐美工人運動的工會主義和經濟主義傳統。這些傳統曾經具有廣泛的影響，直接導致沙皇和臨時政府垮台，而且滲透了布爾什維克。如果這些傳統持續壯大並保持主導地位，革命俄國可能由此成為歐洲式的民主社會主義國家。美國社會學者進而認為，民主社會主義的歷史可能性是在殘酷的俄國內戰中消失的，因為內戰導致軍事官僚機器的崛起和集中制對工人民主的碾壓<sup>⑳</sup>。然而，比較革命研究大家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認為，這種所謂的歷史可能性並不存在，因為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國際關係以及俄國的經濟地理和比較優勢，都決定了民主社會主義即使被短暫採納也無法持續<sup>㉑</sup>。邦內爾(Victoria E. Bonnell)則把分析延伸到革命前夕，指出沙皇政府對工人運動的鎮壓方式從長期看愈來愈有利於奉行密謀路線的革命組織，而非堅持合法鬥爭的工運組織<sup>㉒</sup>。這些討論反映了冷戰後期美國的政治氛圍，即反對鐵板一塊的認知，將蘇聯視為豐富變體和歷史可能性的集合，承認其中一些因素蘊含着推動蘇聯去極權化的潛能。

美國社會學對蘇聯人口的研究起步也很早，或許和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歐洲各國普遍的人口增長停滯有關。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洲的鼓勵生育和母職現象也在蘇俄發生，引起一定的學術興趣，蘇聯對母職的鼓勵以及託兒所、公共託管機構的社會實驗，使得人口學家對革命意識形態的面相有了更為複雜的認識，意識到社會主義政權可能局部修正其意識形態以保持人口增長這一世界革命的關鍵基礎。1926年的蘇聯人口普查為美國研究蘇聯人口狀況提供了首個系統數據。恩格爾曼(Uriah Z. Engelman)發現主體民族比少數族群有更高生育率，其中俄羅斯族生育率最高，猶太人最低<sup>㉓</sup>。基於相同的普查數據，美國學者預測蘇聯人口將在1970年超過整個西歐的規模，並且在集體化、饑荒和戰爭的影響下仍然能夠保持總體年輕的人口結構<sup>㉔</sup>。然而，蘇聯在二戰期間的重大人口損失導致這一預測徹底落空，連帶關於蘇聯人口的爭論主題亦有所轉變。儘管對蘇聯戰時人口損失的估計始終存在爭議，戰後初期的美國人口學家已經提出蘇聯女多男少問題，並指出戰時的出生率下降和人口逃亡長期而言將會重塑蘇聯的人口乃至整個綜合國力<sup>㉕</sup>。

冷戰開始後，美國社會學家逐漸更新了對蘇聯人口的基本判斷：此時已成定局的不再是革命帶來的穩定人口擴張，而是停滯、衰退和局部過密化。雖然工業化讓人口轉型不可避免，但很難否認二戰慘重的人命損失讓這一轉變大大提前，或許也就此決定了蘇聯與美國爭霸的命運<sup>㉖</sup>。除了蘇聯官方公布的普查數據，隨著美蘇交往增多、俄語培訓加強，蘇聯旅遊部門的統計數字、經濟數據和餐廳數量等也被用來估算人口規模<sup>㉗</sup>。總的來說，蘇聯在較發達的波羅的海和斯拉夫三國的城市地區遭遇人口停滯、衰退以及性別不平衡，而在南高加索和中亞則面臨與第三世界相似的過密化問題，區域比較亦支持這一結論<sup>㉘</sup>。

如果說社會學家對於蘇聯的人口衰減基本形成了一致意見，那麼爭論則聚焦於蘇聯政府對人口問題的反應。從文件和官方話語梳理蘇聯的人口政策並

不困難——人口增長是積極現象，貧困的原因在於帝國主義的剝削而非第三世界人口過密；蘇聯不能接受人口零增長，特別是在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sup>⑥</sup>。然而，在實施層面作判斷並不容易。學者注意到，儘管國家掌握強大的專斷權力，但蘇聯在人口問題上受到多種制約，甚至處於無計可施的狀態。即使有悖其鼓勵人口增長政策，蘇聯仍在1965年廢除了反墮胎法，因為非法墮胎早已大範圍流行，令這項執行成本極高的法令失去存在意義<sup>⑦</sup>。蘇聯許多專家認為，在中亞和南高加索地區實施人口控制有悖於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具有無限增長潛力的意識形態，與蘇聯在第三世界宣揚的反殖話語不符；在人口衰退地區，已進入後極權時期的蘇聯政府懼怕強制動員和國際壓力，不敢推行強硬的生育促進政策<sup>⑧</sup>。蘇聯國內亦有聲音反對制訂經濟社會成本極高的人口政策，主張通過發展科技、強化經濟規劃理性和對外擴張來解決人口過剩問題<sup>⑨</sup>。有學者從法國穆斯林殖民地的經驗出發，推測蘇聯可能採取就地工業化、增加農業灌溉系統、鼓勵區域內移民等方式緩解中亞的人口過密問題<sup>⑩</sup>。

作為美國社會學最早形成的兩個蘇聯研究分支，革命和人口研究頗具方法上的可比性。革命研究看似處理已經成為過去的歷史問題，卻籠罩在反共意識形態的陰影下，隨着美蘇關係改善又開始肩負「蘇聯是否可以成為民主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之問。而人口研究先是經歷了二戰創傷這一導致議題轉換的意外事件，其後又對蘇聯政府如何應對人口結構的變數心存警惕。革命研究早期依賴抽象思辨，後期則隨着美蘇關係緩和而獲得翔實資料；而人口學自始至終保持着基本的資料供應，且隨着研究手段進步掌握愈來愈多的信息。同樣面對資料的相對不足，革命研究逐漸走上了跨國比較分析之路，通過多個共產黨革命的比較探究「蘇聯是否可以更好」的反事實之問；而人口研究亦訴諸來自多個地區（特別是穆斯林世界）的理論模型。這些比較在在說明，不論後殖民視角所強調的意識形態偏見，還是兩極對抗視角所強調的資料獲取困難，都不構成蘇聯研究的固定本質。它們都可以在時空變異中被克服和應對。（未完待續）

### 註釋

① 參見Peter Rutland, "Sovietology: Who Got It Right and Who Got It Wrong? And Why?", in *Rethinking the Soviet Collapse: Sovietology, the Death of Communism and the New Russia*, ed. Michael Cox (London: Pinter, 1998), 32-50。另可參見該書有關1990年代美國學界對「蘇聯學」的系統反思。

② Vladimir Shlapentokh, "American Sovietology from 1917-1991: An Attempt at Diagnosis", *Russian History* 22, no. 4 (1995): 418-21.

③ Mike Haynes, "On Michael Cox's *Rethinking the Soviet Collapse. Sovietology, the Death of Communism and the New Russia*", *Historical Materialism* 10, no. 4 (2002): 317-21.

④ David C. Engerman, *Know Your Enemy: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s Soviet Exper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4-7, 336-38.

- ⑤ Martin K. Whyte, "From Physics to Russian Studies and on into China Research: My Meandering Journey toward Soci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7, no. 1 (2021): 4-5.
- ⑥ Dorothy Ross,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61-62.
- ⑦ Seymour M. Lipset, *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 Company, Inc., 1960), 313-15; Daniel Geary, *Radical Ambition: C. Wright Mills, the Left, and American Social Thought*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60-65.
- ⑧ Richard Swedberg, "Communism in North American Sociology: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Commitment and Social Theory",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15, no. 4 (1980): 238-41.
- ⑨ John A. Hall, *Diagnoses of Our Time: Six Views on Our Social Condition*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81), 38-39, 90-91, 130.
- ⑩ Uta Gerhardt, *Talcott Parsons: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192, 278.
- ⑪ 關於二十世紀美國人口學、人口轉型理論在二戰後的變化，參見 Susan Greenhalgh,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pulation Science: An Intellectual, Institution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Twentieth-Century Demograph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38, no. 1 (1996): 26-66。
- ⑫ Wolfgang Knöbl, "Theories That Won't Pass Away: The Never-ending Story of Modernization Theory", in *Handbook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ed. Gerard Delanty and Engin F. Isin (London: SAGE, 2003), 97-98.
- ⑬ 冷戰時期醫學社會學發展史和主要範式，參見 Uta Gerhardt, *Ideas about Illness: An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Medical Sociolog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9)。有關福利國家的發展，參見 Gøsta Esping-Andersen, "The Three Political Economies of the Welfare Stat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20, no. 3 (1990): 92-123。
- ⑭ 有關環境資源因素對社會結構和變遷影響的討論早在 1920 年代就已開始，而環境社會學作為一個學科則興起於 60 到 70 年代之間，是當時美國社會運動的一部分。參見 Matthias Gross, "Early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American Classics and Their Reflections on Nature", *Humboldt Journal of Social Relations* 25, no. 1 (1999): 1-29。
- ⑮ Roman Szporluk, *Communism and Nationalism: Karl Marx versus Friedrich Li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 ⑯ Rogers Brubaker, *Nationalism Reframed: Nationhood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the New Europ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⑰ 《美國社會學雜誌》、《美國社會學評論》和《社會力量》的創刊時間分別是 1895、1936 和 1922 年，與蘇聯成立不完全重合。
- ⑱ Perry Anderson, *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 (London: N.L.B., 1974); Shmuel N. Eisenstadt, *The Political Systems of Empires* (New York: Free Press of Glencoe, 1967), 39, 186-87.
- ⑲ Reinhard Bendix, *Nation-building and Citizenship: Studies of Our Changing Social Order* (Garden City, NY: Anchor Books, 1969), 190, 208-11。與班迪克相似的還有摩爾 (Barrington Moore) 和斯考切波 (Theda Skocpol)，下文將着重論述。
- ⑳ Cyril E. Black, eds., *The Modernization of Japan and Russia: A Comparative Study* (New York: Free Press, 1976).
- ㉑ Sam Prendergast, "Revisiting the Harvard Project on the Soviet Social System", *The Oral History Review* 44, no. 1 (2017): 20-21.
- ㉒ Pitirim A. Sorokin, *The Sociology of Revolution* (Philadelphia, PA: J. B. Lippincott Company, 1925).
- ㉓ Richard Pipes, "Max Weber and Russia", *World Politics* 7, no. 3 (1955): 374-79.

- ②④ Barrington Moore, *Soviet Politics: The Dilemma of Power; the Role of Ideas in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 ②⑤ 參見 Lewis A. Coser, "Marxist Thought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the 20th Centu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 no. 1 (1972): 173-201; Robert J. Brym, *The Jewish Intelligentsia and Russian Marxism: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Intellectual Radicalism and Ideological Divergence*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78); Christopher Read, *Religion, Revolution, and the Russian Intelligentsia, 1900-1912: The Vekhi Debate and Its Intellectual Background* (Totowa, NJ: Barnes & Noble, 1979)。
- ②⑥ 奠基性的學者如 Alexander Rabinowitch, *The Bolsheviks Come to Power: The Revolution of 1917 in Petrograd* (New York: W. W. Norton, 1976)。
- ②⑦ Stephen F. Cohen, *Bukharin and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A Political Biography, 1888-193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243-69.
- ②⑧ Theda Skocpol,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220-35.
- ②⑨ Victoria E. Bonnell, *Roots of Rebellion: Workers' Politics and Organizations in St. Petersburg and Moscow, 1900-1914*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 ③⑩ Uriah Z. Engelman, "Vital Statistics in the Soviet Union in 1926",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38, no. 3 (1932): 437-40.
- ③⑪ Frank Lorimer, *The Popul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History and Prospect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6).
- ③⑫ N. S. Timasheff, "The Postwar Popul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54, no. 2 (1948): 148-55.
- ③⑬ J. A. Newth, "The Soviet Population: Wartime Losses and the Postwar Recovery", *Soviet Studies* 15, no. 3 (1964): 345-51.
- ③⑭ J. A. Newth, "Some Trends in the Soviet Population 1939 to 1956", *Soviet Studies* 10, no. 3 (1959): 252-78.
- ③⑮ Richard H. Rowland, "Regional Population Redistribution in the USSR: 1979-84", *Soviet Geography* 27, no. 3 (1986): 158-82; Juris Dreifelds, "Demographic Trends in Latvia", *Nationalities Papers* 12, no. 1 (1984): 49-52; V. M. Khodachek, "On the Formation of Population in Regions of the Far North of USSR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Aldan Mining District)", *Soviet Geography* 15, no. 5 (1974): 297-98.
- ③⑯ J. F. Besemeres, "Population Politics in the USSR", *Soviet Union* 11, no. 2 (1975): 117-21; Timofey Ryabushkin and Michal Jaranowski, "On Soviet Population Issue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9, no. 3 (1983): 569-72.
- ③⑰ David M. Heer, "Abortion, Contraception, and Population Policy in the Soviet Union", *Demography* 2, no. 1 (1965): 531-39.
- ③⑱ Philip R. Pryde, *Conservation in the Soviet Un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 ③⑲ Helen Desfosses, ed., *Soviet Population Policy: Conflicts and Constraints*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1981), 146-50.
- ④⑰ Michael Rywkin, "The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Demographic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s in Soviet Central Asia", *Nationalities Papers* 7, no. 1 (1979): 30-32.

周陸洋 浙江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李文榕 浙江大學社會學系碩士